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書社

译注 赵 益

审阅 周勋初

陈书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陈书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施 维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陈 书 选 译

赵 益译注

巴蜀书社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3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趙益

周勛初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陈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短暂的王朝之一，从公元557年陈武帝陈霸先代梁自立到公元589年隋军灭陈，共经五帝，凡三十三年。记载陈朝历史的官修正史《陈书》，篇幅也较少，计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

《陈书》是唐初修成的。唐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修撰隋以前各朝史书，集公私之力，最后撰成八部，即后世所谓“唐八史”，《陈书》为其中的一部。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记载，武德中唐高祖已诏命修撰魏、周、隋、梁、齐、陈六

史，至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藏于秘阁。”……在此之前，姚思廉之父姚察曾著《梁书帝纪》七卷、《陈书》二卷。据《陈书·姚察传》：“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涕泣奉行。”他受命修撰后，乃采“谢昊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傅縡、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旧唐书·姚思廉传》）实际上，姚思廉在贞观二年就开始编撰了，所以刘知几说《陈书》是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由此可见，《陈书》虽有姚察的旧稿在前，魏徵又任监修之责，也加入了一些文字（《本纪》与《皇后列传》总论），但主要还是由姚思廉完成的。

具体地说，唐初编撰《陈书》时的材料来源有二：一是前代编撰成书的史料，如顾野王的《陈书》三卷，傅縡的《陈书》三卷，陆琼的《陈书》四十二卷，陈《永定起居注》八卷，陈《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陈《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陈《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陈《至德起居注》四卷；二是姚察的旧稿以及姚思廉在隋代开始续写的部分草稿。宋曾巩《陈书校序》说：“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艰难如此。”所以说《陈书》编撰的时间不止九年，姚氏父子对《陈书》的撰成传世，无疑是很有功的。尽管由于其时战事频仍，时局混乱，史料搜集保存不易，因此其书仍有不少错误与杂乱的地方，但姚氏父子在纂修此书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而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姚氏父子原籍江左，陈亡后迁居关中，据《南史·姚僧垣传》）《陈书》作“姚僧坦”，应依《周书》、《南史》作姚僧垣）载，姚察父僧垣本以医

术见赏，属于庶族阶层。姚察少时学习勤苦厉精，夜以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梁末任原乡县令、著作佐郎，参与修史。陈后主时任吏部尚书。陈亡入隋，官至太子内舍人、秘书丞，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姚思廉历仕陈、隋、唐三朝。陈朝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后为代王杨侑（即隋恭帝）侍读；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乃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史家评论他说：

“笃学寡欲，受汉史于家尊，果执明义，临大节而不可夺。及笔削成书，箴规翊圣，言其命世，亦当仁乎！”（《旧唐书·姚思廉传》）对其史学上的成就作了较高的评价。

纵观姚氏父子的一生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史学思想的源流轨迹。姚氏父子出身于庶族阶级，历仕数朝，一直担任文学之职。在陈亡以后被迫北上依附于关陇世族，因而表现出一种较消沉的情绪。虽然姚思廉作为“藩邸之旧”而“深被礼遇”（同上），但姚氏父子叙及南朝旧事时，仍然摆脱不了没落的情绪。不过，他们毕竟与门阀世族有所不同，在思想上也有革新图强的一面，比如在撰写中尽管多所隐讳，但又能委婉其词，透露事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虽有崇古之处，但无薄今之词。这在入唐以后的姚思廉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陈书》撰成后藏于秘阁，传之甚少，至宋嘉祐七年（1062）诏天下藏书家悉上唐前八史异本，《陈书》始得校勘刊布，广为流行。后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的一种。

二

陈朝只有三十三年，在南朝诸代中疆域最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均无特殊建树。而依史籍著述而言，在唐初公私修撰的前代八史中，《陈书》亦算不上上乘之作。但尽管如此，由于记载陈朝历史的早期著作大部分亡佚，《陈书》自然也就成了研究陈史的重要资料，因此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历来的史家经常把梁、陈二史并称，除了两书同为姚氏父子所撰外，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陈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叙述的简洁精炼，凡无须铺张敷陈者，记载均甚简明扼要，所谓“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赵翼《陔余丛考》卷七）。更为难得的是，六朝文风争尚骈俪，一直延续到唐初，各种著述的行文均受其影响，而姚察、姚思廉父子却崇尚散文，开始对六朝文风作变革，《梁》、《陈》二史

全用熟练的古文撰写。清赵翼说：“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九）《梁》、《陈》书“劲气锐笔，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同上）评价十分公允。在本书所选的篇目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陈书》的行文乃是十分明畅流利的古文，《高祖本纪》、《侯安都传》、《袁宪传》、《萧摩诃传》等都是非常出色的篇章。

《陈书》的另一特色是体例谨严、编次得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超过了《梁书》。《四库总目提要》曰：“今读其列传，体例秩然，出于一手，不似《梁书》之参差”，可见《陈书》在撰写体例上自有独到之处。《梁》、《陈》二书均继承了《汉书》以来的“类叙”之法，《陈书》在此基础上对“列传”的编排更为严谨，更有伦序，较好地体现出古代国史的传统。

《陈书》最后完成于大统一的唐朝，加之又有杰出的政治家魏徵的参与，因此唐初的进步史观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比如《陈书》中改变了南北朝时期南方诟称北方诸朝为“索虏”的陋习，代之而称国号，对魏、齐、周诸帝也皆称谥号，反映出唐代开国以后民族政策的开明。唐代设馆修史，

是唐代开国君主认识到“以史为鉴”方能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作为一名伟大政治家的魏徵，撰写的史论更能借史论今，表现出敬民畏民的可贵思想。他在《陈书》中撰写的《陈本纪·总论》，和他的谏议风格一致，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当然，《陈书》在表达方面的缺陷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避讳太多，其中原因，一是由于姚氏父子本身经历所致，二是因为《陈书》多承前代国史旧稿，不可避免地沿袭了“书美讳恶”的笔法。《陈书》多避讳，不仅表现在对那些篡夺皇位、骨肉相残的丑行“避而不书”上，如高祖篡梁杀梁敬帝、世祖夺嫡杀衡阳王陈昌以及高宗逼取皇位杀始兴王陈伯茂等事，还表现在讳过隐恶，多所掩饰，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后主的态度。姚氏父子对后主的丑行多方遮掩，把陈亡的过错全推到后主宠幸的“狎客”身上，其序兴亡，也充满了阴阳五行、图讖灾异的陈腐思想，与魏徵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观点相较，真有天壤之别。

与之相联系的，是记叙中多浮词溢美。姚思廉为其父姚察作传有修饰之处，尚不足论，而《陈书》为虞寄、虞荔兄弟作佳传，暴露出了姚氏父子不能超越于为亲友溢美这一封建史官的通病。因为

姚氏父子本与虞氏兄弟在陈朝共事，又与荔子虞世基、世南同仕隋朝，入唐后，思廉与虞世南同列十八学士，关系亲密，遂作溢美过当之词，这就难免为后人所诟病了。

姚氏父子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与陈朝统治者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陈书》总共三十六卷，而“本纪”及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了十一卷，使《陈书》几成了陈氏家传。另外，《陈书》虽称简洁，但也记载了不少空洞无物的诏令奏疏等芜词，这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三

《陈书》原书三十六卷，计《高祖本纪》二卷、《世祖本纪》一卷、《废帝本纪》一卷、《宣帝本纪》一卷、《后主本纪》一卷、《皇后列传》一卷、《王子列传》三卷、《宗室列传》一卷、《诸臣列传》二十二卷、《孝行列传》一卷、《儒林列传》一卷、《文学列传》一卷，其中诸臣列传有二卷移在最末，收有陈一代的“叛臣”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以及始兴王叔陵、新安王伯固，算是一种特殊的类传。同《梁书》一样，《陈书》亦无“志”，这是因为贞观十年（636）修成